

# 人性的局限性与可塑性

## ——论菲利普·基切尔对社会生物学的人性观批判

郝 苑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 社会生物学依循“威尔逊阶梯”的总体思路,运用广义适合度、进化稳定策略、博弈论分析等概念或方法来刻画与界定人性。通过细致分析,基切尔揭示了社会生物学在探求人性过程中犯下的一系列方法论谬误,并在研究结论中混杂了大量迎合新右翼政治立场的阶级偏见、种族偏见与性别偏见。基切尔试图表明,尽管人性在基因制约下有其局限性,但人性依旧可以在这种约束条件下得到重塑与改进。社会生物学对人性固定性的仓促论证,并不足以说服人们放弃让人类社会变得更加公正与平等的种种努力。

**关键词:** 社会生物学;人性;威尔逊阶梯;人性可塑性;社会达尔文主义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1)01-0054-08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1.01.007

### The Limitation and Plasticity of Human Nature:

### Philip Kitcher's Criticism on the View of Human Nature in Sociobiology

HAO Yuan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Following the general guideline of "Wilson's ladder", sociobiology has applied inclusive fitness, 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 game theory analysis and other concepts to portray and define human nature. Through detailed analysis, Kitcher revealed that sociobiology has made a series of methodological errors in exploring human nature, and mixed a large number of prejudices including class prejudice, race prejudice and gender prejudice into research conclusions to cater the new rightist's political ideology. Kitcher has tried to confirm that human nature has its limitation under the restriction of genes, but it still could be reshaped and improved in such constraints. Sociobiological urgent arguments for the fixity of human nature are so unreliable that these can't prevent people variously working hard to make human and society more impartial and equal.

**Key words:** sociobiology; human nature; ladder of Wilson; plasticity of human nature; Social Darwinism

### 一、社会生物学探求人性的总体思路与基本立场

社会生物学是一种致力于系统研究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的理论,而让其在当代智识领

域获得巨大声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生物学在“新的综合”的名义下,并没有将自身局限于研究非人类的动物社会的规律与特性,而是将相关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结论拓展到人类社会,试图在社会层面上描述与刻画人性的诸多

收稿日期:2020-10-08

作者简介:郝 苑(1980—),男,浙江绍兴人,副研究员,哲学博士,主要从事科学哲学、文化哲学研究。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重要的特征与倾向。然而,社会生物学的这种研究进路对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带来巨大影响的同时,也遭到大量的诟病与非议。批评者认为,社会生物学家在对人类行为的遗传基础貌似客观的研究中,混杂了大量宣扬阶级歧视、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的错误观点,或明确或含蓄地主张了一种基因决定论,为那些积极推进阶级剥削、种族压迫与性别不平等的右翼激进政治实践作出了理论辩护。

社会生物学家迅速对这些批评意见作出了回应。首先,并非所有的社会生物学家都将自己的研究视角拓展到人类行为之上,某些严格将自身局限于非人类的动物社会研究的社会生物学家反对人们将上述与人性有关的批评意见适用到自己身上。其次,许多社会生物学家宣称,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社会生物学的评价标准应当是科学真理与科学事实,社会生物学不应当仅仅由于自身得出了有悖于某些人的政治理想的研究结论而遭到批评<sup>[1]</sup>。最后,以威尔逊为代表的社会生物学家在作品中经常否认自身持有那种过度简化的“基因决定论”,在他们看来,这种简化版的“基因决定论”并没有恰当概括出他们的论证思路与根本立场。

美国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菲利普·基切尔认真对待了社会生物学家的上述回应。在基切尔看来,为了让批判更加具有针对性,应当在社会生物学的内部作出区分。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可以大致将社会生物学分成两类:一类专门研究非人类的动物的社会性规律,另一类则试图对于人性与人类社会制度提出诸多宏大的论断。前者在审视非人类的动物社会行为时是小心谨慎的,而后者为了扩大自身的影响,经常“以强烈的兴奋之情大声宣布有关人性的断言”<sup>[2](P455)</sup>。反思与批判社会生物学所刻画的人性观,就应当将批判的焦点放到后面这类社会生物学之上,基切尔将之称为“流行的社会生物学”<sup>[2](P15)</sup>。尽管基切尔同情和理解那些左翼文化批评家的政治动机,但他认为,有关社会生物学的争论,不应当被其显著的政治后果分散

精力,而是应当主要聚焦于“关于证据的争论”<sup>[2](P9)</sup>。这就意味着,首先需要梳理社会生物学家用来证明他们所支持人性观的总体思路与基本立场。

基切尔指出,尽管社会生物学家对于许多理论问题存在分歧,但是,他们探求人性的研究进路,在整体上依赖于社会生物学的开拓者威尔逊所提出的思路,基切尔将这个思路称为“威尔逊阶梯”,它是在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论背景下展开的。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任何生物为了获取必要的生存资源而彼此展开竞争。一个物种的成员在发展历史的任何阶段都可能发生变异,物种成员间的差异将影响其生存与繁殖的竞争能力。那些通过变异获得了诸多适应环境特性的物种成员,就有可能比其他成员更为成功地生存与繁殖,而这些特性也将通过适合度更大的物种成员,更多地传递给生物的后代。结合遗传学的理论知识,这些特性将造成物种成员的基因差异,而自然选择将确保那些更适应环境的基因在这个物种的绝大多数成员中固定下来。

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威尔逊提出了社会生物学从自然生物出发探求人性的“阶梯”。

第一,通过确证进化历史的标准方法,确证某个群体G的几乎所有成员为了使适合度最大化,就会在它们遇到的典型环境下表现出一种行为方式B。

第二,B是通过自然选择,才成为在G中广泛存在的行为方式的。

第三,由于自然选择只有在基因存在差异之处才起作用,因此,在G的那些表现B的成员与那些无法表现B的成员之间,存在着诸多基因差异。

第四,鉴于这些基因差异与行为方式B对环境的适应性,就可以表明,难以通过改变社会环境来更改这种行为<sup>[2](P132)</sup>。

基切尔指出,“威尔逊阶梯”探求人性的关键论证思路在于,人类的特定行为方式在广泛的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最大化了适合度,因

而成为了拥有基因基础的行为方式,成为了人性的重要表现,甚至成为了某种独立于人类认知控制的原始冲动。有限制地改变环境,不足以改变这些行为方式,而激进地彻底改变人类的社会环境,固然有可能改变这些行为方式,但会付出“不可估测的代价”<sup>[2](P22)</sup>。

在基切尔看来,威尔逊及其追随者虽承认那些具有基因基础的社会行为可以被环境改变,但这是他们规避被指责为“基因决定论者”的策略,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强调改变这些被他们认定为体现了人性的行为方式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来反对人性的“无限可塑性”,转而强调人性的固定性,并通过人性的固定性来为既定社会行为模式与社会制度的固定性进行辩护。基切尔认为,社会生物学家在探求人性的过程中虽力求公正地对待环境与基因所发挥的作用,但他们实际上仍然低估了环境塑造人性的作用与人性的可塑性。尽管当代生物学凭借累积的大量资料构建了范围广泛的人类进化历史,但这种理论建构并没有穷尽所有可能的进化历史。瘟疫、洪水、地震等突发的偶然事件都“有可能改变一个正在进化的种群的命运”<sup>[2](P43)</sup>,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某些在进化上有极大优势的基因或许就不复存在,而某些在进化上相对不太有优势的基因反倒保留下来。因此,在人类实际进化史中保留的诸多造就了特定行为方式的基因,未必就是那种最有效地让适合度最大化的基因,人性的诸多行为表现与社会制度也就无法被这样的基因完全固定下来。

当然,不同的社会生物学家在攀爬“威尔逊阶梯”时,还积极利用了广义适合度、进化稳定策略、进化的效率等概念或方法来进一步巩固他们所支持的人性观。社会生物学家在研究人性时并非只犯下了一种谬误,而是在阐述人性不同方面的表现时犯下了一系列错误。为了更充分地批判社会生物学人性观的诸多不足,基切尔分别揭示了社会生物学家在阐释性别、民族与阶级时所蕴含的各种社会偏见及他们在论证这些偏见时所犯下的诸多不同的方法论谬误。

## 二、社会生物学的性别偏见批判

两性之间的不平等是困扰着当代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往往承担了绝大多数的家务与亲代抚育工作,但她们在这方面的付出在社会上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承认与回报。相较于男性,女性在工作机会、晋升机会与薪金收入等方面经常会受到不平等的待遇。但在社会生物学家看来,男女之间的不平等有着生物学的根据。由于两性在生理上的差别,他们就必定在社会生活中采纳不同的行为策略。为了让自身的适合度最大化,男性就会尽可能积极主动地寻找异性伴侣来将他的基因传递到下一代,而女性的卵子数量远远少于男性的精子数量,刚出生的婴儿又迫切需要照顾才能存活,鉴于此,女性在性爱的态度上更为保守与谨慎。她们不仅需要尽力寻求那些能提供充分生存资源的可靠男性来作为自己的伴侣,而且在生育后还将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来照顾后代。社会生物学家认为,两性的心理差异与社会行为差异源于两性的基因差异,在灵长类动物中的一夫多妻证明了两性基因差异的普遍存在,漫长的进化过程形成了让女性进行“亲代抚育”的基因,女性的这种固定的行为倾向是难以通过社会变革的方式来加以改变的。

基切尔认为,社会生物学家在论证性别差异时犯下了许多不谨慎的错误,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用粗俗拟人论的方式来考察动物的交配系统。社会生物学描述动物交配系统的概念,来自人类的婚姻制度。虽然两者之间存在不少相似之处,但是通过仔细考察,仍然能够发现许多不可忽略的重要差别。当“一夫一妻制”适用于人类时,总是会指涉到相关的社会仪式与法律协议,而对于动物来说,它们的交配既没有复杂的求爱仪式,也没有相关的法律与契约。更为重要的是,人类的婚配制度总是包含了繁衍后代与亲代抚育的内容,而这些考虑要素会让动物的交配系统呈现出不同于人类的面貌。在狒狒这个灵长类动物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雄性

会与许多雌性交媾,但它几乎不承担任何亲代抚育的工作,而它的“下属”却会协助一些雌性照顾后代。在黑猩猩这个灵长类动物中,虽然所有的雄性都有可能与一个发情的雌性交媾,但当雌性进入真正的排卵期时,无论这段时间多么短暂,雌性都会选择与最有吸引力的雄性进行一对一的交媾<sup>[2](P202-204)</sup>。显然,罔顾人类与灵长类动物在交配关系上的诸多差异,强行将“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或“滥交”等人类的婚配制度与概念适用于动物,这是不严谨的。基切尔表示,虽然社会生物学家巴拉什认为,灵长类动物中的一夫一妻“几乎闻所未闻”,“人类在本性上是一夫多妻的”<sup>[3]</sup>,但是若以哺育方式为标准来进行考察,就可以发现,在200多种灵长类动物之中,多达37种灵长类动物是以成对的方式哺育后代的<sup>[2](P189)</sup>。显然,只有当社会生物学家在粗俗的拟人论谬误的引导下,将人类婚配关系的概念强加到灵长类动物时,他们才会得出“一夫多妻”普遍存在于灵长类动物的结论。

社会生物学家也会运用博弈论的方法来进行定量论证,不专一的雄性在采纳了遗弃雌性配偶的策略后会让自身的适合度增大。基切尔通过严格的数学论证表明,以特里弗斯为代表的社会生物学家进行的相关博弈论分析通常会含蓄地作出两个预设:一个遗弃伴侣的雄性会有更高的概率与第二个雌性交配,并让其卵子受精;第二个雌性后代的存活概率可以比得上第一个雌性后代的存活概率。但是,这两个预设都未必是真实的,尤其是雌性与雌性之间也存在着资源与时间的竞争。由于第二个雌性交配发生于繁殖季节相对较晚的时期,这就让其幼崽在出生时要面对相对匮乏的资源与更为恶劣的气候条件,这完全有可能极大地降低雄性第二轮交配所生产的后代的存活概率,而这个雄性由于遗弃第一个雌性,单亲抚养的结果也会导致第一个雌性后代的存活概率下降。由此可知,在特定条件下,雄性由于不专一而抛弃雌性配偶,完全有可能降低自身的适合度。两性

之间的性行为策略是高度依赖于环境的,每个性别在进行博弈时,都有可能根据环境的变化而采纳多种行为模式,社会生物学用单一的行为模式来刻画两性关系的模型,“显然有一种不现实的气息”<sup>[2](P178)</sup>。

为了论证女性进行亲代抚育的行为倾向的固定性,社会生物学家颇为钟爱的一个例证是“基布兹集体农庄实验”。基布兹农庄是通过混合共产主义与锡安主义的思想而建立的以色列集体社区。在最初阶段,集体农庄中的女性为了从事其他形式的工作而放弃了照顾子女的传统工作,但农庄的第二代女性明确地表示不情愿完全放弃在白天对自己孩子的照顾,开始向女性亲代抚育的传统角色回归。在社会生物学家看来,由于集体农庄的成员都不赞同对女性的传统性别角色定位,因此,农庄的第二代女性是在完全隔绝于对性别角色的传统理解下长大成人的。这些女性对家庭的回归恰恰证明,女性照顾家庭的本性是不容易被外在环境所改变的。基切尔并不赞同这种仓促的推论,他指出,基布兹农庄并不是一个完全隔绝于外部世界的集体,第二代女性的态度与行为倾向不仅仅取决于她们的父母与周围的伙伴,在农庄附近的父权制社会文化同样有可能以隐性的方式影响这些女性,并最终让她们作出了回归传统性别角色的抉择。归根到底,基布兹集体农庄实验的失败所揭示的仅仅是,“一种特定的、非常直接的改变性别角色的方式并没有实现它预期的目标”<sup>[2](P222)</sup>。社会生物学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在社会文化层面上的替代性解释,这就大大降低了他们的论证说服力。

### 三、社会生物学的种族偏见批判

不同于粗陋的种族主义者,很少能看到社会生物学家赤裸裸地为某个特定种族的优越性进行辩护,但是,社会生物学家热衷于为不同民族之间的敌意作出正面的解释。他们认为,根据同一物种所处地区的不同,可以将之区分为诸多群体,不同群体适应不同环境的策略是不

同的。当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相遇时,就可能引入对另一个群体来说是灾难性的行动策略与社会安排。又由于两个种群所共同青睐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这将激起群体之间的斗争。正因如此,漫长的进化机制让人类形成了“反对陌生者的敌意基因”,“人类身上强烈的先天倾向,使我们易于深陷非理性的敌意来应对外在的威胁”<sup>[4]</sup>。任何民族对其他民族的敌对态度都有着生物遗传的基础,它并不能轻易通过社会文化的影响而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基切尔对于社会生物学家的上述论证思路颇不以为然,他表示,这个论证思路犯下了一种粗俗的还原论谬误。只要一个人对人类的战争史以及相关的政治活动有一个基本的理解,就会发现,对于民族之间的重大战争决策来说,“社会制度与社会态度并不必然反映个体的追求。尽管一个国家的大多数公民热爱和平,但这个国家仍然有可能是侵略性的”<sup>[2](P31)</sup>。社会生物学家根据物种个体的遗传天性来论证整个民族的攻击性与侵略性,这个论证思路的总体方向就错失了此类政治问题的关键所在。然而,社会生物学家对于物种个体争夺资源所采纳策略的博弈论分析,往往会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错误的方向之上。

为了让博弈论分析更加便利,社会生物学家假定,一些动物为了特定的可分割资源而相互竞争,其中的两只动物在资源附近相遇,两者都更偏好于独自获取整个资源。进而假定,这两个竞争者力量都相差无几,但它们有两种策略可以选择:一种是“鹰策略”,即为了资源而进行逐步升级的斗争,直到自己受伤或对手让步;另一种是“鸽策略”,即避免为了资源而进行争斗。当采取不同策略的竞争者相遇时,它们竞争的结果就有所不同,因而造成提升适合度的期望值也发生相应的变化。社会生物学家通过博弈论分析表明,采纳鹰策略的竞争者虽然通常会取得更大的回报,但这种策略在适合度上造成的影响未必都是最有利的,因为当它遇到同样采纳鹰策略的竞争者时,就至少有一半的

概率失败,由此造成的损伤还会让自身的适合度有所下降。为了让博弈论分析变得更为现实,社会生物学家略微调整了分析的前提,让两个竞争者存在力量上的差距。于是,更谨慎的策略则是一种“鹰—鸽混合策略”,即当竞争者遇到比自己力量更弱的动物时就采纳鹰策略,而在遇到比自己力量更强的动物时就采纳鸽策略。社会生物学家相信,当一个种群的所有成员都采纳鹰—鸽混合策略,那么在自然选择下就没有任何变异的策略能够侵入到这个种群中,这个策略也就成为了进化稳定策略(ESS)。进化稳定策略的概念表明,对于外族与异类的敌意和攻击普遍存在于诸多生物之中,即便两个不同物种在相遇时没有发生冲突,那也是由于它们自身力量的不足。

尽管这个博弈论分析看似缜密,基切尔仍然发现了其中的疏漏。他指出,进化稳定策略并不是那种最优进化策略,而仅仅是相对于一组潜在的竞争性策略而言的<sup>[2](P92)</sup>。在上述博弈论分析中,鹰—鸽混合策略相对于鹰策略与鸽策略来说是进化稳定策略,但可能采纳的策略并不仅限于这三种。由于失去资源对占有者在适合度上造成的损失,可能会大于成功掠夺者在适合度上获得的增长,因此,竞争者也可能采纳有产者的策略,即在自己占有资源时采纳鹰策略,而在遇到已经被占有的资源时采纳鸽策略。根据博弈论分析表明,在适当条件下,有产者的策略是相对于鹰—鸽混合策略的进化稳定策略,而这种策略尽管在捍卫自身占据的资源时对待其他物种成员具有攻击性,但当其他物种成员没有掠夺资源的意图时就不会展现自身的攻击性与主动的侵略性。由此可见,当有产者的策略在特定条件下成为某个物种的进化稳定策略时,对陌生者的攻击性与侵略性就不会普遍存在于这个物种之中。基切尔表示,进化论的智识威望是在不断驳倒各种潜在竞争性假说的过程中逐步确立的,然而,社会生物学家在利用博弈论分析论证人性的攻击性与侵略性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不利于自身立场的

策略,这也就让他们对于民族敌意普遍性的论证显得颇不可靠。

#### 四、社会生物学的阶级偏见批判

在一个存在不同阶层的人类社会中,诸多社会阶层就会在其享有的收入、福利和权力等方面存在差距。在社会生物学家看来,一个社会的上等阶层比下等阶层拥有更多资源的根据在于,他们能够成功地繁殖更多的后代,将各种资源与机会都集中到上等阶层,有助于提高这个社会整体上的繁衍效率。不平等分配资源的做法会显著降低底层民众的生活质量,甚至让他们无法结婚生育,断绝他们繁殖后代的可能性。但根据汉密尔顿的亲缘选择理论,不应当根据个体的存活与生殖能力,而是应当根据个体在诸多(并非必定是自己的)后代中成功传播自己基因的能力来衡量生物群体对环境的适应性。生物个体即便自身不生育,但通过帮助与自己有亲缘关系的其他个体的生存与繁殖活动,也可以提高传播自身基因的能力,从而让自己的广义适合度显著提高。根据上述观念,就可以理解蜂群中不育工蜂的行为。虽然它们自身并不生育,但它们通过辛勤的劳动帮助有亲缘关系的蜂后和雄蜂顺利生育后代,以此方式传播了它们自身的部分基因,提升了它们的广义适合度。社会生物学家青睐于用亲缘选择理论与广义适合度,来为人类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待遇进行辩护。

基切尔承认,社会生物学家分析确实有助于理解蜂群中不育工蜂的那些看似不合理的行为,但是,社会生物学家想要将蜂群社会结构的有限合理性普遍化,据此为所有等级社会的合理性进行辩护,这种推理就显得过于仓促。社会生物学家亚历山大断定,“生物的所有功能都是繁殖性的,并且要让繁殖最大化”<sup>[5]</sup>,不难看出,这个断言力图要将生物的繁殖能力作为社会评价的唯一标准或最终标准。基切尔指出了这个推断存在的两大问题:第一,评价社会的标准是多元的,恰如尼采所言,“有利于个体延

续的东西,或许对个体的强壮和繁盛是不利的;能保存个体的东西,或许同时也会使个体固定下来,使个体停滞不前”<sup>[6]</sup>,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社会评价。仅仅根据社会成员繁殖的后代数,并不能充分判断这个社会的价值与优越性。第二,即便仅仅按照生殖能力的标准来评判生物社会,像蜂群与蚁群这样的种群也只不过具备相对于它们周围环境的相对适应性。“演变的特性取决于那些为了生存而斗争的生物的相对优势,而不是任何衡量它们成功的绝对尺度。”<sup>[2](P43)</sup>基切尔批评追随亚历山大的社会生物学家就像伏尔泰笔下的潘格洛斯博士一样,在幼稚乐观主义的影响下,他们相信,在自然选择的历史与生物社会性群体的最佳设计之间存在简单的关联。然而,进化的自然选择存在着随机性与偶然性,在进化历史的每个阶段,最佳设计普遍都受制于同时代的诸多约束条件。某些社会性动物在漫长进化过程中形成的等级制度并不是自然选择的最佳设计,它不能成为一切社会的完美范型。

社会生物学家不仅试图为等级制度下的阶级差距进行辩护,而且还试图表明这种阶级差距是固定的,难以通过社会变革来改变这种阶级固化。社会生物学家断言,促使人类行动的动机和欲望是由“下丘脑边缘系统的命令”来决定的,人类的行为不是自由的。社会生物学家进而主张,人类行为的动机从根本上是为了让自身的广义适合度最大化,所谓增进他人福祉的利他行为,归根到底服务于自身的基因在种群中的传播。根据这两个论断,社会生物学家试图证明,人类并不能随意按照内心的政治理想来改变社会制度,那些在表面上追求平等公正的社会实践家的根本动机仍然是利己的。他们即便成功地掌握了政治权力,也迟早会在其政治实践中恢复等级社会中的阶级差距与阶级固化。

基切尔完全不赞同社会生物学家所支持的这种保守政治立场,他指出,即便人类行动的欲望和动机最终受到遗传基因的制约,但正如休

谟所指出的,自由的行动并不要求行动不受限制,而是指拥有能力不以既定的方式来行动。就人类的自由而言,欲望和动机并不占据决定性地位。一个人按照自身的欲望来行动,并不意味着这个人必定是自由的。例如,强迫症患者拥有大量强迫性的冲动,他们的问题在于,当明显有证据表明他们的冲动对自身有害时,他们无法自主地不按照那些强迫性冲动的命令来行动。而人类的自由恰恰在于,尽管他们身上有许多源于遗传基因的强大欲望和冲动,但是,他们可以根据获知的有关行为后果的证据来自主修正他们的欲望和意图。当他们得知先前被视为无害的欲望有损于他们所追求的重要人生价值时,他们就能够抑制这些欲望<sup>[2](P432)</sup>。进而人类行为的多样动机无法都被还原为追求广义适合度最大化的利己动机。莎士比亚笔下的考狄利娅为了捍卫父亲李尔王的尊严而被杀,狄更斯笔下的西德尼·卡顿为了爱情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即便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能看到子女花费时间和精力悉心照顾年老患病的父母。上述体现了人性尊严的利他行为在文学与日常生活中都不罕见,但很难看出这些道德行为能有助于这些行动者的广义适合度的提高。社会生物学家用来否定人类自由与利他主义的论证是片面的与狭隘的,这种论证不足以为等级社会中的阶级差距与阶级固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辩护。

### 五、社会生物学“奢望”背后的权力谋划

根据以上的分析论证,可以看出,社会生物学用来探求人性的“威尔逊阶梯”在论证上存在着诸多谬误和不足之处:由于进化历史的偶然性,无法通过进化历史确证某种行为方式必定可以让某个群体的适合度最大化;粗俗的拟人论推断,无法有效证明在某种动物中广泛存在的行为方式,也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自然选择并非决定基因的唯一因素,无法在基因差异与行为差异之间形成严格对应的关系;既定的基因与行为方式只具有针对特定环境的相对

优势,而并不必然表现生物功能的最佳设计,在诸多行为方式中体现的人性并非固定不变。可以说,“威尔逊阶梯”的每个论证环节都存在各种方法论的谬误,社会生物学家无法令人信服地证明人性的固定性,更无法令人信服地证明社会制度的固定性。不难发现,社会生物学家的这种探求人性的理论抱负仅仅是一种“奢望”,它无法真实而全面地反映人性的自由、尊严与高贵的重要面貌。

然而,尽管社会生物学对人性的研究是成问题的,但这些研究仍然在欧美的社会文化中享有巨大的声誉。作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在当代最活跃的分支之一,它们甚至深刻影响了欧美政府的许多重要政治决策。当一种混杂着诸多谬误与缺陷的科学理论能够在公共领域中广泛传播时,通常都有政治力量在做幕后的推手。基切尔指出,英国与法国的新右翼分子宣告自身对人类的社会生物学工程的强烈兴趣,就恰恰表明了社会生物学的政治意蕴<sup>[2](P6)</sup>。恰如海德格尔所言,“每一种权力,只要它是在合法性假象中对暴力的设置,它就需要谎言、伪装,需要掩盖自己的意图,也就是要以表面上得到争取的、使被征服者喜悦的目标为幌子把自己的意图掩盖起来。”<sup>[7]</sup>新右翼分子相当清楚地意识到,倘若赤裸裸地倡导他们的那些充满了偏见与歧视的政治主张,就很难赢得女性、外来族裔与底层民众的广泛支持。不过,根据马基雅维里提供的谋略,政治家想要让民众接受其政治建议,就应当运用某种技巧,让民众看到他的提议中明显可见的利益,隐藏该提议背后可能给民众带来的巨大损失<sup>[8]</sup>,新右翼分子就转而求助于社会生物学有关人性的论断。由于社会生物学是一门客观的科学,以知识客观性的名义,就可以在公众面前表现自己不偏不倚的态度,“隐瞒自身立场的片面性与利害关系”<sup>[9]</sup>。由此,科学的客观精神也就蜕变成了这些拥有权势者手中“最珍贵的工具之一”<sup>[10]</sup>,他们积极利用社会生物学的诸多仓促推断来将人类的所有成员都贬抑为廉价的“生殖机器”,并试图说

服民众仅仅依据繁殖后代的目的来评估各种政策的价值。当女性、外来族裔与底层民众接受了这种扭曲的人性观之后,就很可能将新右翼分子提出的诸多对自己不利的政策视为有助于社会整体繁衍后代的政策,并欣然赞同与接受这些政策。总之,社会生物学的普遍盛行,有助于在民众中传播这些反映了新右翼分子政治意识形态的人性观念,这将有利于新右翼分子操控民意,扩大政治影响,并最终更为顺利地剥削与奴役社会弱势群体。

正如福柯指出,“哲学的作用在于警示权力的危险,这始终是哲学的重要功能之一。”<sup>[11]</sup>基切尔对社会生物学的人性观的哲学反思与批判,不仅细致地揭示了社会生物学的诸多方法论谬误,而且有力地揭露了在社会生物学背后活动的新右翼分子的权力谋划。倘若接受了社会生物学的这些貌似客观无害的人性论断,将对人类社会的平等与公正构成极大的威胁。在清除了上述的方法论谬误与权力误导之后,人们或许会对人性形成一种更为全面与公允的理解:由于基因与环境等因素的制约,人性是有局限性的,尤其是人类的认知能力是有局限性的。进化理论家、行为遗传学家、发育生物学家、发展心理学家、社会学家、认知心理学家与人类学家等在当代取得的研究成果还有许多不成熟之处,不足以通过理论的综合来充分描绘出人性的所有可能面貌,因而也就无法可靠地证明人性是固定不变的。不过,尽管人性在基因的制

约下有其局限性,但人性仍然可以在这种约束条件下不断进行自我塑造与自我超越。一种有生命力的哲学,不应当在没有充分科学证据的情况下就冒然否定重新塑造人性和社会的可能性,而是应当积极地探寻改进人性与社会的诸多可能性,并为了让人类社会沿着更为公正与平等的方向发展变革而点亮更多的希望之光。

### [参考文献]

- [1] Edward Lumsden, Charles Wilson, *Promethean Fir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40.
- [2] [英]菲利普·基切尔. 奢望: 社会生物学与人性的探求[M]. 郝苑,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 [3] David Barash, *The Whispering Within*[M]. London: Penguin, 1979: 110.
- [4] [美]爱德华·O. 威尔逊. 论人的本性[M]. 胡婧,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5: 105-106.
- [5] Richard Alexander, *Darwinism and Human Affairs*[M].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9: 25.
- [6] [德]尼采. 权力意志[M]. 孙周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350.
- [7] [德]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文集: 尼采(上)[M]. 孙周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654.
- [8] [意]马基雅维里. 论李维[M]. 冯克利,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180.
- [9] [美]亚历山大·内哈马斯. 尼采: 生命之为文学[M]. 郝苑, 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 92.
- [10] [德]尼采. 善恶的彼岸[M]. 赵千帆,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166-167.
- [11] [法]米歇尔·福柯. 何谓直言?[A]//汪民安, 编选. 福柯文选(第三卷)[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283.